

“巴厘路线图”：中国如何作为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司长做客《新闻会客厅》

2007年12月28日

来源：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

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会客厅》。十二月十五号，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通过了一项计划，这就是“巴厘路线图”，也被称作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一起来了解一下。

经过两周的艰苦谈判和努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在北京时间12月15号下午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当天的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2009年之前，就气候变化问题新的安排完成谈判，并制定了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路线图”。

在当天举行的全会上，美国代表团突然收回了对这项决议的反对，使得整个决议得以通过。由于会议比原计划延迟了一天结束，很多媒体把这次大会形容为一次“艰苦的”、“无人入眠的”大会。

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指出：“巴厘路线图”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历史中的一座里程碑，它将为人类下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指引前进方向，中国为绘制“巴厘路线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小萌：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就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苏伟司长，同时也是这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首先请您跟我们解释一下“巴厘路线图”，表面一听以为是一个旅游路线图呢，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苏伟：实际上这一次通过的“巴厘路线图”是本次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通过的一个重要的结果。

李小萌：如果这是一个路线图的话，这个图要带着我们去哪儿？

苏伟：这个图的目标就是要在未来两年就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来进行有关问题的谈判，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议定书是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1997年达成的。

李小萌：其实之前大家也知道，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京都议定书》，这三者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涵盖或者是承接的关系呢？

苏伟：实际上“巴厘路线图”是公约和议定书的一个继续。在开会之前，围绕着2012年以后如何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各方有不同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坚持还是应当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轨道，这样的道路，来继续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发达国家觉得这个公约、议定书的规定对他们来讲是不利的，他们就想推翻这个东西，否定公约和议定书的模式。否定公约主要是否定公约里所确认的“共同但又区别的责任”这么一项原则。否认议定书就是否认他们要率先量化减排的责任，他们认为是有损于了，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借着《京都

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到期，2012 年这个机会，翻这个案，就想重新推倒公约、议定书，重新来过，重新谈判新的法律文件，来取代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也是这一次巴厘岛会议斗争的一个焦点问题。

李小萌：这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个谈判一直相持不下，致使闭幕的时间都拖后了一天，这个谈判到底是卡在哪里了？

苏伟：实际上气候变化的会历来是这样，很少有按时结束的。当然这个也说明气候变化问题的确使大家都比较关注，也涉及到各国切身的利益，所以最后谈判的激烈程度也是非常之大，特别是美国在，因为它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它在 2010 年以后应当承担怎样的减排指标的问题，美国向来是反对接受这种国际上强化的量化减排指标的，所以他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他自己不但不做，反而希望发展中国家采取更多的措施和行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李小萌：到后来这个谈判能够妥协，“巴厘路线图”能够横空出世，又是在哪儿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苏伟：实际上也是美国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最后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李小萌：是美国在强大压力之下是吗？

苏伟：对，当然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在一些问题上争得比较厉害。欧盟强调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要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到 2020 年的时候要相对于 1990 年减少 25% 到 40% 这么一个理想的目标，最后谈成什么样，到时候再说。它提出一个设想来，但是美国不接受，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对这些问题都有很多的保留，所以他们基本上也站在美国这一边，最后欧盟也做出妥协，在“巴厘路线图”里没有明确提一个什么样的指标。但是各方就这个问题在“巴厘路线图”之后的具体实施过程当中会进一步展开谈判。实际上“巴厘路线图”只是其中一项谈判，好多问题都是悬而未决的，可能下一步各方还有一番激烈的争斗。

李小萌：这种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争斗和谈判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最终的明朗化的结论？

苏伟：这个时限是设定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初步定的是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第十五次缔约方的会议，一般是在十一、十二月份举行。但是到时候能不能达成一项结果，现在看来还很难说，因为这也涉及到美国最后态度能不能根本地变化。说到美国这个态度，今年以来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积极的迹象，但是实质的立场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但是当然美国明年也有总统选举的问题，是不是新的总统上来之后这种立场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但是现在看来还看不出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从政府的角度看，能采取根本转变的一个立场。

李小萌：总之还是有一些未知数的。我们再说回到这次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这么一个应该算是严肃的会议，但是也出现了很多戏剧性的场面，就是说难到了让大会的执行秘书长当众洒泪，您当时在场吗？

苏伟：我在场，他为什么流泪呢？其实挺复杂的，因为这个谈判的确非常紧张，秘书处也做了很多工作，也非常紧张，因为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数也比较多，有一万两千多人。这么一个大会，因为谈判的问题也比较敏感，争论得也比较激烈。最后一天，本来说十四号下午应该结束的，结果一直谈到十五号凌晨两点多钟，将近三点，在关键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下。最终这个磋商小组提出了一些案文，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在第二天出来的文件当中没有反映。第二天早晨大家一拿到文件的时候，大家感到非常惊讶，没有反映头一天晚上，应该是夜里，凌晨磋商的结果，大家看到文件之后就马上要求跟东道国的外长和大会主席，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东道国的外长印尼的维勒尤达召集有关的集团，先召集了美国和澳大利亚、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另外同欧盟也谈了，然后找了 77 国集团+中国。就在外长正跟 77 国集团+中国一些部长和代表团团长进行磋商的时候，这时候大会主席是印尼的环境部长，就开始开会了。当时我不在现场，我是在跟印尼的外长，正跟 77 国集团一块磋商呢。我同事打电话告诉我，说这边要开会通过这个东西了，我说这肯定不行，因为 77 国集团没有最终同意，没有反映昨天晚上谈判达成的一致，也没有反映 77 国集团+中国一百多个国家的立场，所以我跟我同事说立刻举牌子提出程序问题，要求大会主席休会。这算第一次，这应该说就算过去了，结果又有了第二次。休会之后，77 国集团进行了磋商，在 77 国集团磋商完之后，在回到会场的路上，印尼的外长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又把 77 国集团有关的人都召到一起，要去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这时候我刚到外长的会议室，那边我同事又来电话了，说这个会又开始了，又要通过这个东西，我说你再次举牌子，提出程序问题，要停止这个磋商，让印尼的外长跟 77 国集团+中国的主要部长和代表团就这个问题磋商之后再开会，这是第二次。如果是第一次，由于秘书处跟东道国之间有些沟通上的不畅造成了一些误会，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第二次，这个就有点不可接受了。所以我们代表团也向秘书处正式要求，希望他能够做出解释，甚至说如果说涉及到是有意这样做的话，要表示道歉，歉意。因为这的确涉及到 77 国集团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中国这么一个大的集团不在场的情况下，你强行通过东西，秘书处应该是知情的，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应该是一个严重的程序上的过失。

李小萌：所以这个大会秘书长是道歉的眼泪、委屈的眼泪还是怎么样？

苏伟：他有点委屈。具体他究竟为什么流泪，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他的确是觉得自己也挺辛苦，觉得有点委屈。实际上主要可能是他也感到是不是不好意思的感觉，的确这事儿做得不是很好。

李小萌：在去参加这次大会之前，你做好那样的心理准备了吗？就是说这是一次跌荡起伏的一个会，而且随时考验你们的应变能力？

苏伟：事先有所准备，知道这一次会肯定会谈得非常艰苦，我们压力也会非常大。因为从中国来讲，世界都比较关注。因为最近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的消耗，温室气体排放也必然会增加，所以国际上也比较关注。实际上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刚才提到的历史责任问题，现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主要还是发达国家在两百多年的工业化过程当中，毫无约束、毫无节制地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实际上从中国来讲，从发展中国家来讲，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也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拿出诚意，能够真正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发达国家要率先大幅度地减少他们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方面要为他们这个历史过度排放埋单，要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能够有能力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

合作当中来，能够采取减缓气候变化措施，能够适应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李小萌：既然是大会开始之前就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中国代表团的底线和原则是什么？

苏伟：中国代表团是本着一个非常积极、建设性的态度来参加印尼巴厘岛的会议。我们也知道，印尼是亚洲的一个国家，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在亚洲开会，我们也是抱着非常希望能够推动会议取得成果这样的态度来参加这样的会。另一个方面，我们中国也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本着对人类，对世界的未来，对地球的未来负责任的态度，也出于我们自己国内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的需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要求，也还是要非常高度地重视气候变化问题，采取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包括积极参与到有关的国际谈判、国际合作当中来。我们希望能够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轨道继续前进，能够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我们认为公约、议定书已经规定得非常全面，非常具体，只要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我相信我们会很好地、妥善地处理好气候变化的问题，能够最终实现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李小萌：这样一个联合国的大会在巴厘岛上召开，一万多人到那里去，对当地的能源也是一种消耗，我看到大会的花絮说，巴厘岛本身也有一个活动，叫拔掉插头，关掉电源，享受美丽巴厘岛，你们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去了吗？

苏伟：我们把西装都脱了，因为实在是为了节能，我们希望把空调调得温度高一些，这样西装可能就不适合穿了。

李小萌：我在新闻画面里看到您穿个短袖衬衫吧。

苏伟：对，这也是大会主席的要求。除了大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和高级别会议期间，代表们都可以穿便装，可以穿短袖。

李小萌：有没有什么出门就关灯，随手拔电源？

苏伟：这也是一个倡议，也是一个号召。另外联合国我看网站上也提到了，他要为这一次开会而产生的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来搞碳中和，花钱在别的地方去采取节能或者种树的措施，来抵消他们因为参加这样的会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当然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会上有一天下午，在大会议室开大会的时候，空调非常凉，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举牌子，我说主席先生，能不能请秘书处，请东道国把空调给调得高一些，这样我们一方面可以节能，另外我们可以感到更舒服。

李小萌：其他人应该给你掌声。

苏伟：一片掌声。

李小萌：真的，祝贺你。

苏伟：后来主席下来之后专门跟我说，表示非常同意我的倡议。

李小萌：有媒体评价说在这次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的态度和作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来看看在这次大会当中中国的表现。

12月12日上午，本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重头戏——部长级会议开幕，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气候变化工作的副主任解振华发言指出：保护全球气候是一项神圣和崇高的事业，因此必须跨越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少一些美丽的词藻，多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履行。

解振华强调：从1990年至2005年，仅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中国就累计节约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18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此外，中国根据公约的要求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的目标。

李小萌：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解振华先生的发言比较突出的一个主旨，你在这里再跟我们重复一下。

苏伟：实际上这次对中国代表团反映比较好的就是解主任的讲话，其中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是要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原则，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渠道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在《京都议定书》下，发达国家要尽快拿出政治上的诚意，能够尽快达成他们在2012年以后的进一步的减排指标的问题。当时在8月份的维也纳会议上曾经提到过一个大致的减排的范围是25%到40%，我们希望这次能够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确认。第三点就是要加强公约实施的对话，就公约所涉及到的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也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进程和工作组来推动，争取尽快能够达成协议，我们希望达成协议越快越好，2008年最好，如果说2008年不行，2010年之前肯定要有个结果。

李小萌：在参加会议期间你们感受到中国成为整个大会的一个被关注的焦点吗？

苏伟：对，大家对中国的立场还是比较关注的。

李小萌：怎么感受到这种关注呢？

苏伟：因为在每一个议题上，中国都要有声音，都要参与，都要跟中国磋商。中国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行的话，这个案文是过不去的。当时谈判非常紧张，谈判分三十几个谈判工作组，同时在开会，中国代表团虽然人数比较大，有将近四十个人，但是真正要照顾到每个工作组的谈判来讲，有时候也觉得是有点照顾不过来，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所有的谈判磋商。

李小萌：这一次中国代表团给大会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除了你当众提议说把空调调高点之外？

苏伟：其它国家普遍的感觉就是中国这一次的态度比较积极，是正面的、有建设性的，也反映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的未来，对地球的未来负责任的这么一个良好的

形象。联合国秘书长在会见解振华副主任的时候，也专门对中国这一次会议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他一是对中国在参加会议的态度上，觉得很积极，对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也感到印象非常深刻。在巴厘岛会议之前，他也同温总理专门通过一个电话，也是希望能够就气候变化问题，中国采取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温总理也向他进行了介绍，介绍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基本立场和我们积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他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李小萌：在解读“巴厘路线图”的过程中，你总结了四个要素，同时你也把它称作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装上了四个轮子，其中有一条就是适应气候变化，为什么适应本身也成为启动的轮子之一呢？

苏伟：因为应对气候变化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减缓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使气候变暖的趋势能够缓下来，这是减缓的角度。另一个方面就是适应，因为气候发生变化，这是一个不再争论的事实，确确实实发生了，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在气候已经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下，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和不利的后果，人类社会来讲就必须适应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和不利的影响，来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后果。适应，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他们缺少经济上的手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他们没有经济上的能力，来很好地适应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讲，适应气候变化是更为紧迫的问题。

李小萌：哪些具体的做法是属于适应气候变化的？

苏伟：比如说要在做国民经济的规划里头要考虑到可能发生气候变化的因素，包括海平面的上升，包括你在沿海搞经济建设的时候，就要考虑气候可能发生变化，海平面上升。另外在农业生产、气候、降雨各方面都会发生一些异常的情况，要在做有关规划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沿海要筑坝，要考虑到海平面可能要上升的因素，比如说以前要筑三十厘米，以后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因素之后可能需要筑五十厘米甚至六十厘米这样一个概念。

李小萌：另外的几个轮子也包括了技术和资金的问题，这又主要针对什么呢？

苏伟：技术，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最终还是要靠技术，因为经济的发展肯定要消耗能源，要不断地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肯定也会增加，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完全不用化石能源也不可能，所以只有通过技术的创新。技术的进步，能够提高效率，能够开发新的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这样才能很好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以技术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技术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更为重要的是有个技术转让的问题，因为现在好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开发能力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所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特别规定了，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这是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的一项规定。

李小萌：另外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了一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也需要您给我们再解释一下。

苏伟：实际上这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体制一个核心的原则。所谓共同，气候变化会影响到地球上所有的人，影响到各个国家，所以使大家都会受到影响，是大家共

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应该通过合作来沟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这是共同。但是对于造成气候变化的责任，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各个国家历史的排放、人均的排放也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消除贫困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面，各国具体的规模、幅度和方式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李小萌：就比方说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少排放这个责任，是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所不能够承担的，是吧，这个理由怎么解释？

苏伟：你说的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这些措施，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做。咱们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也包含了一些具体的，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一些措施，包括我们单位 GDP 能耗到 2010 年要相对 2005 年的水平要降低 20% 这样的指标。国内也是花了很大的力度来重视抓好节能减排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节能降耗也是在国内来讲承担了，是可以测量，可以报告，也可以核实的这样的行动。

李小萌：在国内是如此，那么对外来讲呢？

苏伟：另外关于可报告、可核实，可测量的义务同样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这样的措施，他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也应当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所以这也是这次会议争论的一个焦点，最终也主要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觉得不愿意在技术资金问题上做出这样的承诺。

李小萌：那现在的结果就是妥协了？

苏伟：实际上现在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国内采取适当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时也要求发达国家能够提供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让和资金。

李小萌：作为发达国家来讲，这种支持可以兑现吗？

苏伟：这个就要看发达国家这方面的诚意了，我们希望能够兑现。但是过去，从公约十几年谈判的历史来看，还是有一定难度，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够真正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特别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害，带来的威胁，能够拿出诚意来，能够各尽所能，能够兑现他们在公约、议定书下所承诺的有关的技术转让，提供资金的法律义务，因为这是法律上的义务，他们必须得做。

李小萌：像发达国家提的一些理由，一些技术是属于私人公司的，国家没有办法要求他把这个技术拿出来。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

苏伟：因为这个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人人都要做贡献，涉及到人人的利益，所以我一样主张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还是应该讲点奉献精神，用中国的话说还是应该讲政治。你是有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因为对于人类所面临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大的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不是说你不能够从这个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知识产权当中获得利益，你可以赚钱，但是你不能过度地依靠这个来发气候财，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发达国家把这个技术转让

的问题、资金的问题推向市场，借口要保护知识产权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发达国家从政府角度来讲，首先他们有法律上的义务。根据公约，他们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另一方面，他们政府也还是有手段、有责任来采取一些激励的措施。财政上、税收上采取一些鼓励的办法，能够促使私人，能够引导私人掌握的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如果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这样的技术，可以以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经济代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对全球都有利的。

李小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节能减排方面究竟做了怎样的承诺和努力，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年6月4号，《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北京正式对外发布。这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第一部国家方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当天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个方案是根据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义务而制定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方案的颁布实施，彰显了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这个国家方案确定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政府措施。方案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要一手抓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一手抓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尽管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地节能减排，困难和问题很多，但是我们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且一定能取得明显的成效。”

李小萌：其实在节能减排方面中国一直在做着努力，有一些目标也在逐步地去实现，为什么现在还要以一个国家方案的形式把它制定和公布出来？

苏伟：国家方案，是一方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中国内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内在的需求，刚才马凯主任也提到了这一点。另外一个根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个缔约方有义务来制定、公布、定期地更新，并且要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方案。我们也是为了落实公约当中我们所承担的义务来制定这样的方案，主要是结合我们国内可持续发展的一些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也本着对世界，对人类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地在国内落实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李小萌：在这个国家方案当中具体的一些约束指标给我们讲一些。

苏伟：约束指标基本上也就是十一五规划当中所提到的2010年单位GDP能耗相对于2005年来讲要降低20%，可再生能源开发要达到10%。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森林覆盖率的一些指标，这跟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指标是一致的。另外国家方案还包含了若干项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有关的节能降耗的一些具体政策，包括各个行业、各个重点领域的有关具体措施。

李小萌：所以这个国家方案应该看作是既对内也对外的一个承诺，这样理解准确吗？

苏伟：实际上从形式上讲是履行了公约下的一项义务。从内容上来讲，主要是根据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根据我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这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内在要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李小萌：像您所在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前身叫做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个称谓上的不同背后体现了一些什么？

苏伟：原来的叫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它是一个部门间的协调机制，这个小组是由国家发改委来牵头，马凯主任是对策协调小组的组长。今年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国际上也是炒得非常热，最近几年我们也的确确实感到气候变化对中国来讲影响很大，影响到我们的粮食生产。我们灾害频发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国际上对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很高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采取减缓温室气体增长的这样的一些措施。今年六月份，国务院也正式决定，要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组长，曾培炎副总理和唐家璇国务委员作为副组长，有十八个部门的部长或者首长担任领导小组的成员，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

李小萌：级别的提高具体在做工作的时候会有哪些更方便的地方？

苏伟：实际上如果说有了这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更容易各个部门之间更好地协调，也利于加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项工作的一个组织协调。这样对外也是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高度重视，高度负责的这么一种形象。

李小萌：这次开完会回来，我想你也是经历了非常疲惫的几天，现在缓过来没有？

苏伟：现在还好。

李小萌：除了疲惫，除了要随时应对之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是什么呢？

苏伟：因为巴厘岛通过这个结果，它只是一个开端，实际上硬仗还在后头，只是启动了这样的谈判进程，下一步最终会达成一个什么结果，能不能真正地推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问题上取得进展，还有一场硬仗、恶仗在等待着我们。

李小萌：你说还有一场恶仗在后面，考验主要会在哪儿出现？

苏伟：这个可能要到最后的，我估计应该是在 2009 年的时候，因为在 2008 年可能大家还是在相互之间相互摸底的过程当中，真正摊牌可能要到 2009 年，各方才能拿出真实的东西来。

李小萌：谢谢你。